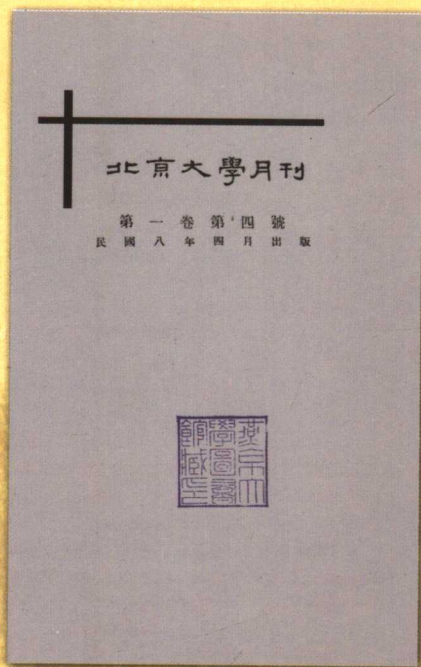


现代中国

第八辑



55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现代中国

第八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中国·第八辑/陈平原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1
ISBN 978-7-301-11517-6

I. 现… II. 陈… III. 社会科学 - 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63444 号

书 名: 现代中国·第八辑

著作责任者: 陈平原 主编

责任编辑: 艾 英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1517-6/G·203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mm × 1092mm 16 开本 19 印张 450 千字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第八辑

目 录

论 文

- 重溯中国精神分析学的历史轨迹…………… 张京媛(1)
- 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思想史研究 …………… 欧阳哲生(25)
- 重建“中国现代文学”
- 在学科建制与民间视野之间 …………… 陈平原(48)
- 从“尚友录”到“名人传略”
- 晚清世界人名辞典研究 …………… 夏晓虹(62)
- “受动”与“能动”
- 王国维学术变迁的知识谱系、文体和语体问题…………… 王 风(84)
- “国族”还是“文化”:清季遗老群体的“晚明想象” …………… 秦燕春(101)
- 《世界繁华报》语境中的《官场现形记》写作…………… 何宏玲(125)
- 现代中国的青春想象…………… 宋明炜(145)
- 湘省革命:地方历史与个人记忆 …………… 凌云岚(163)
- “向左转”:1930年前后波希米亚式艺术家在上海…………… 葛 飞(186)

演 讲

- “城市文化研究”视野中的北京…………… 赵 园(205)
- 关于《正红旗下》…………… 赵 园(219)

书 评

晚清报刊与妇女史研究

——读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 闵 杰(229)

近代学术转型研究中的结构性原创之作

——评左玉河先生的《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 王法周(234)

作为问题的“现代”与“中国”

——读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刘 岩(239)

现代性的橱窗

——评〔法〕白吉尔的《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 杜 英(243)

地图与坐标：“近代”体验如何空间观察？

——评《魔都上海——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 彭春凌(248)

北京文化研究的新气象

——《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读后…………… 窦 坤(254)

文学性的视景

——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吴晓东(259)

“非诗意”的诗史及其书写

——评《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 张桃洲(265)

在历史“原生态”与学科焦虑之间

——评《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代轨辙》…………… 张丽华(273)

深入文学变革的腹地

——评《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从晚清到“五四”》…………… 陆 胤(278)

难以逾越的地平线

——评《浮出历史地表》…………… 袁一丹(283)

探询文学研究的新视域

——评贺桂梅《人文学的想象力》…………… 张慧瑜(288)

民族国家视野与现代文学研究范式的重构

——读倪伟《“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 张春田(293)

编 后…………… (300)

重溯中国精神分析学的历史轨迹

张京媛

1931年9月10日,近代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型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刊登了一则消息: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这位奥国的医生,现在已足七十五岁的高龄了。他的学说,在另一方面,也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样,极影响现代思潮,虽则他的学说的对不对,还是现代学者争论未易解决的问题。自他的学说出现以来,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响——例如将他的学理应用于病人的诊断,应用于犯罪学的探究,应用于教育,道德,文学,以及应用以探究“常态人”的欲望动机等。自有他的学说以后,使人对于人类的心灵界改观,他的势力,也可见一斑了。^①

这样评价弗洛伊德,即使从21世纪的今天的角度来看,也是十分适当贴切的。虽然弗洛伊德的学说至今仍有争议,不断地被后人修正补充,但是他的学说自面世后就改变了世人对人自身的理解,影响深远,这点则毫无疑义。

弗洛伊德学说在20世纪初被中国和西方学者介绍到中国,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自进入中国伊始,其命运便随着时政变迁而起伏。更由于精神分析学是一种内心视野的再构,以其独特的方式凸出隐蔽的人性一面,对“性”的注重亦引起各界的不同反应。正因为精神分析学是人之学,不独属某一专科,从而被广泛地运用到各个领域。在当代中国,研究精神分析与文学的关联有一些专著和文章,但是精神分析学在其他领域的作用则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本论文就是试图弥补这方面的缺陷,提供一个比较全面的景观,使读者了解20世纪前半叶精神分析学在中国各界的影响。

中国学者与弗洛伊德直接联系之可寻历史痕迹,是弗洛伊德写给章士钊的一

^① 《东方杂志》28卷17期,1931年9月10日,第15页。

封便函的影印件,刊登在章士钊翻译的《弗罗乙德叙传》一书的扉页上^①。当时章士钊(1881—1973)旅居德国哥廷根,对精神分析学理论很感兴趣。他翻译了弗洛伊德的 *Selbstdarstellung* (《弗罗乙德叙传》),并且预备翻译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引论》^②。在阅读德文原著时,章士钊给弗洛伊德写了一封信,然后收到了弗洛伊德的回信:

尊敬的教授先生:

不论您使用何种方式实现您的意愿——将精神分析学介绍到您的祖国中国,或是为我们的杂志 *Imago* 撰写文章,用贵国的语言材料来检验我们对古代表述方式的推测——我都很高兴。我的讲稿中所引用的中文数据来自于《大英百科全书》(第11版)的一篇文章。

顺致崇高的敬意

您的弗洛伊德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七日^③

虽然章士钊写给弗洛伊德的原信没有留下记录,但是我们可以从这封回信里推知:章士钊向弗洛伊德表示了他对精神分析学的兴趣,告诉弗洛伊德他正在从事翻译工作,准备将精神分析学介绍到中国。他向弗洛伊德提出问题,请教那位大师是怎么得到有关中国的知识的。佛氏在回信中承认他使用的是参考数据,即那本当时在西方极具权威性的《大英百科全书》。他信中所说的讲稿是指他在维也纳大学作

① 弗洛伊德的德文手写体信函复印件见于章士钊译《弗罗乙德叙传》(Sigmund Freud, *Selbstdarstellung*),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1页。原文如下:

27.5.1929

Hochgeehrter Herr Professor

Ich bin überaus erfreut durch Ihre Absicht, in welcher Art immer Sie sie ausführen wollen, sei es daß Sie die Kenntnis der Psychoanalyse in Ihren Heimatlande China anbahnen, sei es daß Sie uns Beiträge für unsere Zeitschrift *Imago* geben, in denen Sie unsere Vermutungen über archaische Ausdrucksformen am Material Ihrer Sprache messen. Was ich in den Vorlesungen aus dem Chinesischen anführte, war aus einem Artikel der *Enzyklop. Britannica* (11th edit) genommen.

In vorzüglicher Hochachtung, Ihr Freud.

② 据高觉敷在自传中回忆:“《精神分析引论》一书,本来章士钊老先生函告云五先生要译,定名为《解心术》。云五先生回信给他说已请我翻译了。章老先生说要等我的译本出版后再看。后来译本出版了,他没有提出批评意见,似乎我所译的书已被专家们通过了。”(《老骥奋蹄——心理学一代宗师高觉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页)

③ 本译文参照了张黎先生的译文(收余凤高《“心理分析”与中国现代小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36页)。

的讲演,后结集为《精神分析学引论》。在那本书中,弗洛伊德断定梦的不确定性的本质是所有古代语言表达法的一种普遍的现象。梦和古代语言的根本区别在于,古代的言语和书写符号尽管不精确,多具象征意义,却是用来作为交流的工具;而梦中的符号仅仅是自我表达,并不以被理解为目的。弗洛伊德例举汉语来说明古代语言和释梦的类似性。他说:汉语本身充满着不确定性,足以使人感到恐怖。汉语的单音节字,一般有十种不同的意思。为了防止歧义,汉语把两个音节合并成词组,发音有四声。如果不把单音节的字放在句子里,则无法看出那个字是名词、动词或形容词。汉语的单词没有词形变化,没有性别、数量、主宾格、时态、语气。汉语只有原材料,如果出现不确定性,则需要依靠听者的智力来判断上下文。听者的任务同释梦者的任务很相像,阅读汉语也和释梦一样,都必须依靠语境即上下文来获得正确的答案。很明显,弗洛伊德不懂汉语,他以汉语为例只是为了说明释梦的作用。我们可以想象精通古汉语的章士钊当年读到弗洛伊德引用汉语知识时的兴奋,同时他也对弗洛伊德这样阐释汉语产生了疑问,于是写信询问。结果弗洛伊德谨慎地回复说:“我的讲稿中所引用的中文数据来自于《大英百科全书》(第11版)的一篇文章。”

正如弗洛伊德回信中所欢迎的那样,章士钊有志将精神分析学介绍到中国,并且付诸行动。他在德国时,不仅翻译了弗洛伊德的自传《弗罗乙德叙传》,嗣后亦翻译了德国语言学家师辟伯运用精神分析学来解释语言现象的专著《情为语变之原论》(Hans Sperber, *Über den Affekt als Ursache der Sprachveränderung*)。章士钊用文言文翻译的这两部精神分析学著作本身就是文化再植的典型,尤其是弗洛伊德自传。“弗氏之书难译,英美人且叹之,况吾人理想全异,术语不具,德文构造,去吾文绝远,难又百倍于英美人乎。”章士钊译《弗罗乙德叙传》时没有借助其他语种的译文,完全是直面原著。由于他使用的是文言文,因此必须依靠中国的历史文化典故来完成他的再植创造,别出心裁地杜撰出精神分析学的术语。例如他将 *Theorie der Verdrängung* (repression) 译作“窟藏说”,将 *Compromiß* (compromise) 译作“龟兹之道”,将 *paranoia* 译作“华胥狂”,等等。这在精神分析学跨文化移植史上是不可多得的一例。章士钊本人称精神分析学为“饮食男女之学”,推崇备至。他在自己的文章中也不时利用精神分析学来分析中国文化,以心解移治文史。例如章士钊在《论五常》一文中,就将中国伦理文化的基础解释为源于性欲。

据笔者所知,最早的一篇专门介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文章是刊登在1920年11月的《东方杂志》上的《弗洛特-加龙省新心理学之一斑》。自此以后,有关弗洛伊德学说的出版物数量持续增长,许多杂志和报刊都登载了专文,也有不少专著出版。从笔者收集的“精神分析学的专著和论文的目录”^①来看,在1930年代中

① 参见张京媛编撰:《中国精神分析学史料》,台北:唐山出版社,2006年。

期,精神分析学出版物的数量达到高峰,成为知识界熟悉的主题和题材。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内精神病医院被迫关门,知识分子南下或者是北上,整个国家经历着生死存亡的浴血抗战。心理学研究的项目也从个体研究转到社会和国家的主题,例如《法西斯主义和心理学的实验》、《战时精神病》、《战争心理学和快速战争》等等。不过,心理学的翻译工作还在继续,精神分析学的译作仍然时有出版。1950年代后,由于政治导向的改变,精神分析学被作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心理学受到批判。但即便如此,批判精神分析学的文章也不得不指出,精神分析学在中国依然存在着影响:“弗洛伊德主义在解放前的我国也有过不小的影响,这种影响今天也不能说已彻底被根除,因此反弗洛伊德主义的斗争对我国来说也有其现实意义。”^①

根据笔者所收集的材料,20世纪前半叶译成中文的弗洛伊德专著共有四部:一部直接译自德文——章士钊译的《弗罗乙德叙传》(Sigmund Freud, *Selbstdarstellung*),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其余三部译自英文——中国心理学家高觉敷译的《精神分析引论》(Sigmund Freud,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也是高觉敷译的《精神分析引论新编》(Sigmund Freud, *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北京大学心理学系讲师夏斧心译的《群众心理与自我分析》(Sigmund Freud, *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上海开明书店1929年5月初版,10月再版。另外,弗洛伊德的一些文章也被译成中文刊登在杂志上,例如:以出版《性史》和创办“美的书店”出名的留法博士张竞生曾从法文摘要翻译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纲要》和《梦的分析》,刊登在1931—1932年的《读书杂志》上;高觉敷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弗洛伊德的《心之分析的起源与发展》(Sigmund Freud, “On the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刊登在1925年的《教育杂志》上。

虽然日本在20世纪初期就已经翻译出版了日文版的《弗洛伊德全集》,但是笔者没有发现任何直接从日文翻译过来的弗洛伊德本人的著作。除了文学界以外,对日本的精神分析学著作的中文评论和翻译几近于零。这一点颇为有趣,值得我们费些笔墨说一说。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初开设心理学课程是1903年。清末民初的心理学书籍大都是翻译或重译的日本心理学著作,自编的心理学教材也主要参考了日本译介的西方心理学内容,译著者大都是留日学者,同时也有日籍教员受聘到中国来教授心理学。这么看来,在引进西方心理学上,日本确实起了桥梁作用。比方说,中

^① 孙晔:《国际学术界反弗洛伊德主义的斗争》,载《心理学报》(*ACTA Psychologica Sinica*)1959年第4期,第269页。

国沿用了日本的说法：“心理学”、“精神分析学”或“心理分析学”^①。据了解，1917年，中国精神研究会在日本神户成立，出版以研究与普及催眠术等精神学理和应用为宗旨的《精神》杂志，并且办理函授业务，但是现存的几期《精神》杂志并没有刊登精神分析学的文章（《精神》杂志后于1919年停刊）。在文学批评上，有几部论述精神分析与文学的关系的著作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并且在文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日本作家厨川白村所著《苦闷的象征》（鲁迅译，1924年）和松村武雄的《精神分析与文艺》（谢六逸译，1927年）。但是，除了文学批评的译文，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有关精神分析学的著作寥寥无几。

可以说，中国引进精神分析学的主要途径来自欧美。究其原因，大致由于中日几乎是同步开始从欧洲引进精神分析学。更重要的是，作为西方知识中转站的日本，1920年代以后由于各种原因，在中国的知识界和教育界逐渐失去了主导地位。

作为一个比较，我们可以考察一下日本引进精神分析学的经过：虽然在20世纪早期，中国与日本同时期引进了精神分析学，日本方面相对更为注重精神分析学机构的建立，更为有系统地翻译介绍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当时几个日本精神分析学家争立山头，竞相与弗洛伊德本人联系，渴望得到“教主”的首肯。20世纪初，有三个日本人曾经分别在欧洲维也纳拜见过弗洛伊德本人，弗洛伊德也与几个日本学者有书信往来，他们的通信原件至今保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弗洛伊德档案里。^②截至1939年，《弗洛伊德文集》已经全部被译成日文出版。东京和仙台都有精神分析学研究所，也有私人医师开业用精神分析学的方式给病人进行治疗。^③虽然如此，根据日本文化改造过的精神分析学依然处于初步探讨阶段。日本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家古沢平作（Kosawa Heisaku, 1897—1968）1932年在维也纳进见弗洛伊德时，向他提交了一篇论文，提出一个基于佛教神话的“阿阇世情结”（Ajase complex，这个理论强调母子关系的“弑母未遂却得到母亲原谅后的负罪心理”），比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强调父子关系的“阉割恐惧心理”）更适于日本文化。据说，当时弗洛伊德听到古沢平作提出的设想未置可否。至今我们不清楚为何如此，只能推测也许两人之间存在着语言沟通问题，也许弗洛伊德觉得不了解日本文化不便发表意见。古沢平作后来写信询问弗洛伊德对他的论文的看法，但是弗洛伊

① “Psychoanalyse/Psychoanalysis”一词的汉译有几种，比较常用的是“精神分析学”和“心理分析学”，这两个词可以互换。但是就其词义分析，“精神分析学”是医科专业术语，与“精神病学”同源，而“心理分析学”则为心理学术语，比较通俗、大众化一些。

② 参见：美国国会图书馆弗洛伊德档案；Geoffrey H. Blowers and Serena Yang Hsueh Chi, “Freud’s Deshi: The Coming of Psychoanalysis to Japan”, 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Vol. 33, No. 2, pp.115-126.

③ Kiyoyasu Marui, “Die Psychoanalyse in Japan”, in *Gelbe Post.* No. 1, May 1939, p.9.

德在简短的回信中并没有提及古沢平作的论文。^① 亚洲人用佛教经典故事解释东方文化心理,向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理论的世界普遍性提出挑战,古沢平作可以说是首例。二次世界大战后,精神分析学在日本得到推广,古沢平作的理论才开始受到日本学界的重视。“阿阇世情结”被延伸为“依赖情结”(Amae complex),比较广泛地运用到日本社会心理分析和精神分析学临床诊断上。古沢平作于1955年创立日本精神分析协会(Nippon Seishin-Bunseki Kyokai),至今有近50名会员。直到现在,日本精神分析协会的多数成员仍然坚持传统精神分析治疗方法,即一周四次治疗,让被分析者躺在长椅上,以自由联想为治疗手段。^② 然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在欧美之外的日本和中国迄今都未成“显学”,其中自有欧美与东亚不同的社会文化原因,此外,精神分析学领域本身也处于不断演变分化之中,值得学者们进一步探究。

20世纪初,国外学者来华讲演推动了精神分析学进入中国。例如,诺贝尔奖获得者、数学家和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1920年应邀来中国讲学一年。^③ 罗素讲演之一的《心之分析》连载于报纸,后来又编成书出版。对于当时被译为“心灵解析”的精神分析学,罗素这样说:“在中国知道此术的固然不少,但在欧美则连街上也每每有人谈到,或且用来编剧,做小说书,所以差不多人人知道了。”^④ 罗素利用精神分析法在研究潜意识方面的突破来说明人类多数欲望都是潜意识的欲念,这样便有充分的理由结束那种将“意识”作为精神现象根本概念的历史性错误。然而罗素也认为,虽然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学说很重要,但是精神分析学认为人的欲念都是关于“性”的方面就不免有些过偏了,人还有其他诸如名利和权力的欲念等等。

罗素批评中国文字古奥,阻碍了现代中国学术和教育的发展,建议简化汉字或使汉字拼音化,以便使一般平民接受相当的教育。^⑤ 他的意见也得到其他外国人的支持,有一位外国人士甚至就汉字成为现代中国人沉重的负担的现象作了精神

① 1996年在波士顿的全美亚洲学会的年会上,我被邀在一个主题为“Ajase complex”的讨论会上做评论员。在这个研讨会上,所有宣读论文的学者都是日本学专家,唯独我这个评论员例外,的确有些汗颜。可喜的是,我的评论得到与会发言人、日本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小此木启吾先生(Okonogi Keigo, 1930—2003)的赞赏。会后同小此木启吾先生交谈,得知他是古沢平作的学生,从他那里,我听到了古沢平作的这段轶事。

② <http://www.jpas.jp/treat01-e.html>

③ 美国实用主义大师杜威在中国的两年期间(1920—1922),其学术讲演中没有提到过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只是讨论了与弗洛伊德理论比较相近的博格森的“原动力”学说,也许是他认为精神分析学不属于哲学的缘故。

④ 《罗素五大讲演·心之分析》,北京:新知书社,1922年,第28页。

⑤ 《讲学社欢迎罗素之盛会》,载1920年11月10日《晨报》。

分析。1927年,英文版的《中国科学美术杂志》(*The China Journal*)刊登了一篇题为《精神分析学与中国文字》的文章,是由一位神经精神医师——麦考尼博士(James Lincoln McCartney)写的。他从一位外国人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字:“很难形容中国人在为了生存和进步而做斗争的路程上所背负的精神负担是多么沉重。中国人完全掌握阅读和写作的知识所必需耗费的心智能源是惊人的。他们对古典作品的酷爱,对古代哲学家们的语录和教诲所具有的自豪感,几乎相当于在自爱程度上的利比多的固恋。精神分析学家分析和试图解放那种保持在这个程度或者说是退化到这种程度上的利比多能量时,可以感觉到一种巨大的潜能。中国人的利比多能量虽然现在仍然纠缠在他们那种繁琐复杂的文字里和停滞在有待于向字母进化的象形字阶段,但是一旦他们的那种能量得以释放,被引导到社会建设中的民族事业上,那将是中国史无前例的觉醒。”^①这篇文章后来被译成德文,转载在1939年的《黄报》上。^②认为汉字阻碍现代化,主张废除固有汉字、改用罗马字式的观点,在“五四运动”时期,就由国内外的文化改革激进派提出过,但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讨论这个问题,麦考尼医学博士应属第一人。

旅居中国的外籍人士确实对精神分析学在中国的流行起了积极作用。例如,弗洛伊德于1910年创办的国际精神分析学协会(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Association)在1939年已经扩展到500名会员,多数是欧美成员,但是有一名会员的通讯地址是中国上海,这个人的名字是阿道夫·约瑟夫·史托福(Adolf Josef Storfer)。史托福1925—1932年任维也纳的国际精神分析学出版社社长,负责出版了德文的《弗洛伊德文集》。1938年底,他逃离纳粹德国侵占的欧洲,辗转来到上海。1939年,他在上海创办了德文杂志《黄报》(*Gelbe Post*)。由于史托福本人对精神分析学的兴趣,他的杂志刊登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其中包括“精神分析学在亚洲”的系列文章。

尽管如此,精神分析学进入中国主要还是依靠中国知识分子的评介和实践。

下面我将分几个方面来介绍精神分析学输入中国的情况:医学,心理学,教育,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社会与文化评论,以及文学批评。

一、临床治疗中的精神分析学

精神分析学首先是一种治疗方法,弗洛伊德本人一直致力于临床心理治疗。

① James Lincoln McCartney, M.D., “Psycho-Analysis and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China Journal*, Vol. 6, No. 1, January 1927, p. 150.

② James Lincoln McCartney, “Zur Psychoanalyse der Chinesischen Schrift”, in *Gelbe Post* (Shanghai), Helt. 1, May 1939.

因此,检验精神分析学在国内医学界的运用是我们调查的第一步。

精神病成为医学专科是现代产物,主要是由教会医学院和外籍医师、教授开始在中国传播的。20世纪上半叶,全国的公立精神病院有五所(位于北平、上海、苏州、厦门和广州),私立的仅有两所。若将全国各地所设的精神病院一并计算在内,至多可收容病人两千余人。据统计,至1948年,全国共有精神病医师不足20人,还有4位外籍医师。^①在民国早期,精神分析学是一种被应用到神经精神病临床医学上的治疗方式。

精神分析学在医学界发生影响,外籍医学教授和医师起了重要作用。据《中国科学美术杂志》(*The China Journal*)报道,1926年3月8日,在上海皇家亚洲协会大厅由Dr. H. Chatley主持的会议上,一位名为W. J. Comerford的先生作了一个题为“精神分析学的基本概念”的演讲,Professor Bary从纯医学的角度发表了他对精神分析学的看法,Dr. Maurice Price进一步解释了精神分析学的概念,与会者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讨论。^②正如这篇报道说的那样,一些在北京和上海行医的外国医师,尤其是精神病院的医师,对精神分析学很感兴趣,已把精神分析学应用在医学教学上。例如波兰人韩芬(Fanny Gisela Halpern, 1899—1952),在维也纳大学上学时就是精神分析学家阿尔弗莱德·阿德勒(Alfred Adler)的学生,毕业后在维也纳大学医学院教授精神病理学。^③她1933年受聘到国立上海医学院任教,后又在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任系主任,开设心理卫生学和神经学课程达十余年,培养出一代中国精神病医学的学者。^④另外,美国精神病学专家雷孟(Richard S. Lyman, 1891—1959)1932—1937年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任职期间,也曾教授过精神分析学,并编纂了英文版的《中国神经精神病学的社会与心理研究》(1939年)一书。^⑤

然而,外籍医师诊断中国病人,有时由于语言障碍,加上对中国国情和百姓生活不熟悉,无法深切了解病因。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从前有一位外国精神病专家初到中国的时候,看见一个朝山拜佛的老太太,身挂黄袋,脚踏芒鞋,目不斜视,口中念念有词,三步一躬五步一拜,他骇然认为是一个严重性的精神病患者,就

① 栗宗华、陶菊隐:《精神病的意义及其对于社会的影响》,载《新中华》(复刊)6卷22期,1948年11月16日,第46页。

② “Lecture on Psycho-analysis”, in *The China Journal*, Volume 4, No. 4, April 1926, p.203.

③ Charles Hart Westbrook, “Psychiatry and Mental Hygiene in Shanghai: Historical Sketch”, in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No. 110, October 1953, p.301.

④ 潘光、王健:《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上海犹太人——犹太民族史上的东方一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95页;Simon Fraser University's Archives, “Fanny Gisela Halpern Record Series F-58-4”.

⑤ Richard S. Lyman, V. Maecker and P. Liang, eds.,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Studies in Neuropsychiatry in China*. Peking: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1939.

因为他不了解宗教仪式的缘故。”^① 因此,在中国建立精神病学科,主要还得依靠受到良好训练的本国医师。这些医师熟悉本国风俗人情,同时也“必须像侦探一样,富于忍耐性,注意病人生活的每一片段,研究他的个性和他的社会和自然环境,注意每一事物的发展,对各方详加侦察后,再予以适当之分晰,才能够有所发现,从而有对症下药之可能。”^②

早期的中国西医学论文多用西文写就,因为多数西医教学直接使用的语言就是西文。美国精神病学专家雷孟主编的英文版《中国神经精神病学的社会与心理研究》一书中的十二篇学术文章,都是由他手下的中国临床医学研究者写的,研究范围包括精神病人预测的方法、精神病人的失语症、精神病人的书法、精神病人的社会学研究等等,充分展现出中国精神病学新一代的勃勃生机。就这个专集体现出的学术研究潜力来看,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干扰,中国的神经精神病研究在1940年代一定会有很大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的第一篇文章《社会学与心理分析学对于医学之贡献》,它是综论,为全书提供了纲领性的概括与总结。这篇文章是由北平协和医学院神经精神病学科的戴秉衡博士撰写的。

戴秉衡(1899—1996)是中国第一位受到美式精神分析学训练的精神分析治疗师。因为他在早期中国精神分析学史上算是一个少有的“货真价实”的精神分析治疗师,也因为他的文章、专著多用英文写就,在国外的声望比在国内的要高,这里有必要专门对他作一点介绍:戴秉衡1920年代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任中华戒毒会秘书长,发表过针对远东殖民地鸦片毒瘾问题的英文研究专著。^③后来他获得奖学金,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当时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在美国赫赫有名,除了培养出一代杰出的美国社会学家以外,也培养出不少亚洲学者。^④戴秉衡的博士毕业论文为 *Opium Addiction in Chicago* (《芝加哥的鸦片毒瘾》,至今仍有英文再版印行)。1932年,他进入耶鲁大学专门为外国研究生开设的“文化与人格”培训班,在为期一年的学习中,结识了美国精神分析临床医学创始人索罗文(Harry Stack Sullivan),其后,接受了精神分析学并学习治疗病人的问讯方式。1935年,戴秉衡受聘于北平协和医学院,任期4年,在那里教授精神分析疗法,并以此诊治病人。日本军队占领北平后,戴秉衡辗转国外,经雷孟教授的推荐,任教于美

① 粟宗华、陶菊隐:《精神病的意义及其对于社会的影响》,载《新中华》(复刊)6卷22期,1948年11月16日,第44页。

② 同上。

③ Dai Bingham, *The Commission of Inquiry and Opium Monopoly; A Frank Discussion of the Problem of Opium-Smoking in the Far Eastern Colonies of Foreign Powers*. Shanghai: National Anti-Opium Association of China, 1929.

④ Henry Yu, *Thinking Orientals: Migration, Contact, and Exoticism in Modern America*.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国杜克大学医学院,教授精神分析治疗法并开业医治精神病患者。戴秉衡后来成为美国精神分析治疗法中的文化人格研究学的创始人之一,并在临床精神分析治疗中形成独特的“戴式分析法”。他关于中国文化与人格的精神分析学著作都是四五十年代以后在美国发表的,影响了一代美国学者对中国文化的想象。

戴秉衡一生似乎只用英文写作,笔者在研究的过程中,没有发现他任何用中文写作的文章。^① 戴秉衡 1939 年在北平用英文发表的论文,题为《社会学与心理学对于医学之贡献》(原中文标题如此)^②,甚至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仍然很有启发性。戴氏在文章中倡议一种新的医学治疗方向,主张重新梳理“健康”、“疾病”、“病人”这些基本概念。他批评说,传统的西医训练使得医生只关注对疾病本身的治疗而不关注患有此病的病人,即“看病不看人”。他认为,医生与病人的关系可以借鉴精神分析学里“分析师与被分析者之间的移情理论”来理解为是互动的,而不是单向的运动。^③ 另外,戴秉衡也批评了西医传统中的生物学偏见:如果疾病没有显示出生理器官上的症状,西医就毫无能力解释这一疾病,甚至心智疾病也被精神病医师看做是由于身体病变引起的。戴氏反对西方医学中的“心身对立”,早在 1930 年代,他就率先提出“身心和谐”的观点,认为精神和身体器官的疾病都是长期生活方式失调的结果,疾病的产生与病人及其家庭和社会环境有直接的联系。戴秉衡对精神分析学理论并不是完全倾服的,只是有选择的接受。虽然他同意“本能”作为人类活动的基力是很重要的,但是他也指出,精神冲突很少在本能与本能之间发生,而通常产生于本能欲望与文化势力之间。戴秉衡对精神分析学的应用侧重于把个人同他的团体和文化联系起来一并考虑,不仅从内部研究精神病的机制与结构,更要研究产生精神病的外部条件。这样,戴秉衡在其理论阐述和临床实践中,

① 虽然戴秉衡不用汉语写作,1930 年代末移居美国后,在职业范围内也很少使用汉语,但是他在给病人进行精神治疗的过程中以及 1950 年代后发表的文章里,经常发挥性地使用“东方哲学”和禅宗对人性的看法,融汇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各种不同学科的观点,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著名的“戴式分析法”,为美国精神疾病治疗专业化作出了卓越贡献。

② Bingham Dai, “The Patient as a Person”, in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Studies in Neuropsychiatry in China*, edited by Richard S. Lyman, V. Maeker and P. Liang. Beijing: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and Henri Vetch, 1939, p. 1-30.

③ 精神病症的诊断往往依靠受过专门训练的医师。过去病人与医师的关系是:病人被动消极,沉默无言,受医师任意摆布。19 世纪末精神分析学创立以后,病人与医师的关系才得到改变。精神分析学里的说话治疗,让求助者意识到自己病症的起因,能够有力量去面对自己的困境,并自主选择一条出路。而精神分析者自己也必须进行精神分析,自己也成为被分析的对象。分析者检验他自己是怎样感觉的,然后试图分析这些感觉,医师和病人之间的关系成了互动的关系。当代精神分析学训练的要求就是学员必须接受数年的精神分析,并且保持自我分析的笔记。

修正与补充了既有的精神分析学。

戴秉衡对精神分析学的贡献是把病人置放于其社会和家庭环境中来考察。他主张了解病人患病的原因及其所处的环境,想办法改善造成病人患病的环境,这样才能有效地诊断和治疗病人。戴秉衡的主张和做法在当时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事实上他也受益于当时的职业环境。他所任职的北平协和医学院从1921年起就建立了社会服务部,存放“病人社会历史记录表”,让医院和社会保持紧密的联系,医院了解病人的家庭情况,对病人作定期随访,为病人做好思想工作,使他们接受医生的治疗方案。^①协和医学院的神经精神科自1933年起,在第三任主任雷孟教授主持下,成为中国神经精神病专科人员的培养基地,并且与北平社会局合作,将原北平市疯人收养所改组为北平市精神病疗养院。^②雷孟为了提高医疗质量,聘用了社会工作人员和心理学工作人员,甚至他本人也要支付两名雇员的工资。^③在这种情况下,戴秉衡的社会学专业的背景,以及他的精神分析学训练,在协和医院的神经精神科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戴秉衡负责北平市精神病疗养院的精神分析治疗工作,同时也开始对协和医院的实习医生和社工人员进行精神分析法的训练,成为中国首届精神病治疗医师协会的核心。^④

精神分析学可以被用来治疗心理障碍和非器质性精神病。使用精神分析学的方法来治愈病人的个案不少,其中有钱萍撰写的《抑郁儿童之个案研究》(1935年)。^⑤钱萍是心理学家高觉敷的硕士研究生,熟悉精神分析学。这篇文章也是在著有《变态心理学》一书的心理学家萧孝嵘先生指导下写成的。钱萍的研究是心理咨询治疗成功的一例。她的研究对象是一位患有抑郁症的12岁的女孩。与传统的精神分析治疗方式不同,钱萍走出医师诊室,与这个女孩交朋友,花数月时间熟悉了解病患的家庭和学校环境,发现女孩患病的主要因素在于家庭的不良环境。同时,钱萍也使用精神分析学中的“自由联想”法,使女孩放松其意识的稽查作用,鼓励女孩讲述她做的梦并且作自由联想。作为观察者的钱萍有选择地记录下女孩讲述的梦,那些较重要的都是明显带有性欲象征的情节。很明显,钱萍熟悉弗洛伊德的性象征的理论,但是她不去作深度分析,只是说:“我们应用心理分析的目的,

① 《话说老协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1—2页。

② 冯应琨:《协和医学院神经精神科》,载《话说老协和》,第149页。读者也可参考英文著作: Hugh L. Shapiro, *The View from a Chinese Asylum: Defining Madness in 1930s Peking*, Ph. D. Thesis, Harvard University, 1995.

③ 张中堂:《社会服务部二十年》,载《话说老协和》,第365—366页。

④ Bingham Dai, "My Experience of Psychotherapy: Some Reasons for My Relative Freedom From Fatigue", in *Becoming Fully Human: The Works of Bingham Dai*, Edited by Sally Atkins. North Carolina: Appalachian State University, 1997, p. 49.

⑤ 钱萍:《抑郁儿童之个案研究》,载《心理半年刊》2卷2期,1935年6月1日。

仅在使她的各种情丛,能有一个机会去表达,并希望能藉此以减轻其抑郁之倾向而已。”虽然钱萍的做法可能放弃了积极的精神分析治疗法,没有充分发挥分析者的潜能,没有帮助病人寻找其“情意综”的症结以期最终治愈病人,但是精神分析学的其他方法到底还是起了作用。通过钱萍的精神分析法治疗,这个女孩的心理状态逐渐好转,在学业及行为方面也有了进步。钱萍总结说:“心理分析法并不是神术,也不是‘百效药’,它还得借着外界适合的环境及各方面之合作,才能获得最后的成功。这就是说,我们如果要使滢芝的心理状态十分健全,除由心理分析法予以救助外,还须视其家庭环境及学校环境能否善为适应而定。”与戴秉衡一样,钱萍强调社会与家庭对个人的心理健全起着主导作用。

在精神分析学作为医学治疗方法这一领域,我们注意到由冯鸿所写的《“下意识”与精神病》一文^①,这是一个比较罕见的个体试图通过自我分析而医治精神疾病的例子。冯鸿是一位以写作和教书为主的城市知识分子,自幼体弱,成年后患有常年神经衰弱和强迫症。为了战胜疾病,他向精神病专科医师粟宗华求治,采取自救措施,广泛阅读多种心理学书籍,有意识地观察和矫正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病情的发展。他将自己的自救经历写成文章,寄给在《新中华》杂志主办“健康通讯”专栏的舒新城。鉴于战后“患精神病的太多”^②及有感于社会对精神病人的普遍歧视,舒新城决定刊登这篇文章,公开讨论人类精神病问题,并且在题为“精神病与环境及个人体质的关系”(上、下)的文章中,与冯鸿探讨精神病的起源与治疗。冯鸿在文章里表达了他对弗洛伊德的性欲为精神病理之肇端的观点^③及其潜意识结构内容的怀疑,但是他认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对治疗精神病的确是有效的,尤其赞成病者本人的“工作治疗”(working through),他自己就是一个身体力行的受益者。但是因为冯鸿是自学成才的,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文章中使用的一些神经精神学的基本概念有些混乱。例如,冯鸿断言,神经衰弱的身体症状大部分是由暗示造成的,因此可以用暗示移去,这个说法并不确切。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看出,精神分析的新观念在很多层面上影响着人们,这包括冯鸿在认知层面寻找精神病治愈途径,努力扩大自我视野,同时也与人分享自己的“工作治疗”法。舒新城的回复一部分是他自己的亲身体验(个人经验与私见),一部分

① 冯鸿:《“下意识”与精神病》,载《新中华》(复刊)6卷8期,1948年4月16日。

② 舒新城:《健康通讯专栏:精神病与环境及个人体质的关系(上)》,载《新中华》(复刊)6卷4期,第18页。1947—1949年三年间,舒新城(中华书局总编、教育学家、出版家,1893—1960)在《新中华》杂志上开办了一个《健康通讯》专栏。有不少人来信询问心理和精神症状,三分之一的来信人自称为神经衰弱者。讨论的题目有:未病先忧,自卑感和精神健康,神经衰弱,精神作用与心悸,精神病与情绪控制问题,精神病和环境及个人体质,等等。

③ 在此,我们可以参考戴秉衡的行医经验:他在北平协和医院任“精神治疗医师”的两年间,遇到的所有精神异常病人的发病原因都是集中在性欲方面的。见戴文。